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成逻辑、价值彰显与基本经验

王 成^{1,2}

(1.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 广西桂林 541004)

摘 要: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学术界和思想界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就其生成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文明急剧扩张与东方世界历史性衰落的“病理症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社会因素。中国社会各阶级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败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政治因素。十月革命的爆发和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波动起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国际因素。就其价值彰显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要求,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这一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体现着中华民族渴望由失败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时代要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辩证统筹本土和外来两种文化、辩证统筹守正与创新两种手段及辩证统筹工具和价值两大属性三大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仍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两个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治理体系、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富有生命力和效率就是因为其

始终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赓续与传承。^[2]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怎样实现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学术界和思想界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直接关系到身处 21 世纪的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历史,还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现在,也关系到如何准确锚定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19YJC710068);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斗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究”(20B006);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2020MKSJDC08)

作者简介:王成(1982—),安徽定远人,博士后,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成逻辑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所决定的,更是由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的历史作用决定的。

(一)资本主义文明急剧扩张与东方世界历史性衰落的“病理症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社会因素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现代性的一种形态,最为积极的历史贡献在于,它给人们的物质性财富总量爆炸式增长创造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毫不讳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然而,作为一种权力,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等“硬”权力到文化的“软”权力,从西方工业化世界到东方农业文明世界,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与渗透从未停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 资本文明在西方国家确立以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成为消解现代人主体性的物化力量,财富的增长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异化。概言之,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张力外化导致人类社会的“物化”以及由此产生“单向度的人”。从国际视角出发,伴随着资本主义及其变种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与宰制,它已经最深刻、最彻底地意识到,文化权力意味着控制国内外被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最佳手段。只要控制文化权力,资产阶级就能以隐晦的形式公开声明“西方中心主义”“黄祸论”“种族优越论”等谬论。可以说,正是在“文化”这一“文明世界”代名词的遮挡下,资本主义撕掉了侵略者在道德伦理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把殖民主义、贩卖黑奴和种族屠杀等与人类社会“道德律”相悖的一切行为辩解为“文明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背后隐匿着一条掠夺和剥削合法的价值逻辑。有学者深刻地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

学理叙事逻辑,资本主义存在“资本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的资本逻辑”两条相融共生的线索。在这种条件的规约下,资本及其创造的资本文明,既在历史意义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正能量”,也必然不可避免地暴露限制乃至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负能量”,在消解传统社会统治危机、文化危机及发展危机的同时又催生并深化了新的时代性危机,并且伴随着资本主义世代的演变,这种危机愈加深化,从而出现所谓“资本扩张悖论”。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断言的那样——现代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像“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5]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日益强盛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的相对衰落,生成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毋庸讳言,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兼具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使命”,既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又使“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使得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6] 在殖民主义侵略压迫和封建主义闭关锁国碰撞之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寻找新的生存道路,以应对双重挑战和内外冲击。中国先进分子和思想界首先将“救亡”和“启蒙”的目光投向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从太平天国、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了农民阶级改造中国的资本主义方案,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调和“中西”“体用”,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以“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为号召,鼓励学习西方以拯救危机。由此可知,早期中国一切改变自身命运的方案中都企图植入资本主义文明的基因,但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这种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存在张力,难以获得理想出路。作为一种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与欧洲的内源性现代国家存在显著不同。一方面,在中国内部封建势力,比如以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之流为代表的新旧“权贵”,以或明或暗的方式瓦解和镇压了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

一切努力。另一方面,以侵略和掠夺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等落后国家的异质性文化存在奉行“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竞争逻辑,对于作为异质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改造方案建基于同化和灭亡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如前所述,及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结构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与博弈中日益陷入多元并存、内在冲突的混杂无序状态,在“中心—边缘”文化话语体系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渐被边缘化、污名化,西方意味着先进与发展,东方天然包含落后与停滞。在此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输入并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与较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涅槃重生提供了一种支援性资源。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败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政治因素

社会变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基于内生动力与外在压力综合作用的产物。同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本民族精神基因传承的连续性过程,不存在所谓截然的断裂性,尽管每个时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会有所变化,但一个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和历史仍然在其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结构深层中得以保存和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现代性难题,这种转型既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转型升级的外在压力之下又是中华文明内在发展的需求,关涉是否“被开除球籍”,表征为避免世界其他落后国家诸如非洲被贩卖和殖民及印第安人被灭族危险在中国重演的历史之需。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造成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生产的扩展与私有制的冲突,从而酿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及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语境下资本主义席卷全球,在资本逻辑的冲击和侵袭下,这种矛盾以更加抽象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和蔓延,最终造成东方与西方、城市与农村等多种形式的对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隐晦的方式揭示了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展开逻辑,他说:“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

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在这种语境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逐渐边缘化、外围化、非中心化,落后民族的知识精英致力于解决所谓中国问题,即如何在资本主义文明掀起的这场全球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不至“亡国灭种”,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描述到,“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了。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心的逐步东移及其在中国的集结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性重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在客观上为中国探索超越“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构建“第三种文明”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后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他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退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只有‘第三种文明’,俄罗斯之文明诚是以当媒介之任。”^[9]

中国民主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在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10]中国社会中最为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要出现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形式。瞿秋白以“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和“‘东方式’的死寂”隐喻东西方文化的“危害的病状”,并毫不讳言这两种文化已经不能担当“新文化”的基础,必须以新的文明形态对上述两种文化加以改造。^[11]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属性与阶级属性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在东西方各种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承担中国先进分子救国救民时代重任的“制胜法宝”。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洗礼之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李达

等相继完成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涅槃”和“重生”之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支持者和探索者。马克思主义刊物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宛如璀璨群星,极力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在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此开始,先进分子开始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揖别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转而渴望走上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发展道路,由“拿英美做榜样”转向“以俄为师”,决心以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三)十月革命的爆发和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波动起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国际因素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开始被置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地位,被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分子视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此来应对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不同命运,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何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世界的神效没有在西方世界重现?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的前行是各种“合力”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但主要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推动的。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这种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阶级斗争。十月革命以无可辩驳的形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观的科学性,为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打开了闸门,拓展了中国人寻找现代化道路视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可行性“版式”。彼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道被摆在中国人面前,并列成为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可以选择的参考模式,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由“以西为师”转变为“以俄为师”,决心将“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付诸

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及转换升级不是从“本本”到“本本”、从教条到教条纯理论式的逻辑推演,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和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另一方面,在中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造理论”。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社会主义 170 多年的运动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复杂曲折的历史图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语境不可忽视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波动起伏。承前所述,面对西方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张力,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是消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为其重建、再造及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机遇,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莫里逊药丸”和“万能灵药”。相反基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诸如“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往往会攻讦中国道路、歪曲中国形象、挑战中国理论、否定中国实践,其目的就是以西方理论和西方道路毁灭当代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实施文化渗透,政治上实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改旗易帜,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潮,跌到了谷底,怎样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张力关系又一次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前苏联和东欧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马克思主义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详尽地提供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12]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彰显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及其革命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被束之高阁,不可能成为书斋里的学问,也并不是什么玄奥和僵死的理论,而是要随着时空的转化和实践的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基于

此,从中华文明复兴视域出发透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对于廓清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脉络仍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要求,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这一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了全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为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和道路。然而,任何理论的萌蘖、发展与成熟都不可能只是纯粹主观世界的“灵机一动”,而是必须建基于人的社会实践。同样,马克思主义并非经典作家脱离现实生活的“虚妄镜像”,而是其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引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理论和实践“双螺旋式交互上升”的基础上得以创立、丰富和发展起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分析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时指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13]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一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14]这就是说,实践对于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变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需要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何以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如此巨大的生机与活力?一言以蔽之,理论的需求程度和实现程度关键在于理论是否能够发现和正确解决人们所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圣经”和“指南”来到中国首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需要。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需求,需要不断发现、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才能得到完善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讲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高度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

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6]

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列宁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文化的结合,形成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不断“理论化”,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列宁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难而勇敢的探索,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列宁告诫俄国社会主义者“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17]这就是说,随着时空的变化和转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完善和发展,因而其对实践的指导和未来的预测只是方向性的,而不能提供“灵丹妙药”和“万能钥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告诫全党同志,既要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又“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8]毛泽东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视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思考逻辑中,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使之成为带有“中国的特性”的民族文化形式。^[1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旨趣,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要求“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0]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体现着中华民族渴望由失败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和内在特质。这个“根”和“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列宁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

“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1]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融通或对话之处：其一，在目标追求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思想中“小康之家”“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追求具有一致性，表达的都是对现实世界价值与意义颠倒和扭曲的不满，二者都寄希望于世界的理性改造，实现人们对于美好社会和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主义主张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思想具有共通性。其二，在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逻辑自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观念，与中国文化经典《易经》《老子》《庄子》等中所述及的“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相生相克”等思辨因子具有契合性。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济用”优良学风具有许多内在关联之处。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2]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邦济世，强国富民”是中国古代贤士达人和有志向、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将个人的“发展梦”与中华文明的“进步梦”有机衔接，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23]

要在中华文明复兴视域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可能性，还必须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在理想、信念和道德及心理结构层面具有强大的稳定性特征，对于东西方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呈现出内在基因不变的超稳定性结构，在古代人类文明体系中具有明显的“自发内生型中心文化”特征。同时，文化的外部结构作为其内在变量的存在形式，受到外在变量的影响与制约，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推陈出新。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基于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侵扰，伴随着中国社会总

体性危机与现代性危机交织的情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后发外生型边缘文化”特征开始凸显。马克思主义“真经”到达中国以后获得了吸取中国文化的土壤，在参与中国实践、坚持中国道路和提供中国方案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升级的“点金石”。在探索国家前途和民族出路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意识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形成依据、内在结构和独特价值、现实载体，都自成一脉、薪火相传。基于这个意义，文化的消亡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的消失，故而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在美洲被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取代意味着印第安人的美洲转化为欧洲人的美洲。反观中国，中国文化虽历经沧桑与浩劫、天灾与人祸，经历了无数次政权更迭、政治变革、经济危机和文化入侵，一次次内外危机的考验与洗礼，但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某种特质始终存在，决定了中国才能成为从“轴心时期”至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明的古老国家。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时代要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近代以来，以资本扩展、政治霸权和文化同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列强的浓浓炮火和战争的硝烟中发展到极致，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异化”发展极端表现，马克思主义基于“多数人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近代求索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进程中出现两种彼此对立和相互攻讦的社会思潮：一是主张彻底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西化主义”，对于五四运动的兴起及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退场起到了一定影响，这种思潮主要是建基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生存性危机而出现的一种应激性效应。从最早致力于借助外力复兴自身的探索与尝试到掀起内生政治变革运动，再逐渐转化为内生文化再生运动，中国知识精英希冀塑造有别于传统社会和西方资本文明迥异的中华文明“新型态”，试图以西方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双重需要。毛泽东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过程，“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

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24]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来说,“西化主义”都是绝不能在当时中国情境下契合于中国国情的,这主要是基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区别和根本性不同。另一种思潮则是主张全盘光复以“孔孟之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派就是所谓国粹主义。辛亥革命失败特别是“一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使国粹主义思想家更加认为,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这一“资源宝库”中寻找解救时弊的“密钥”。国粹主义的头面人物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把“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奉为宗旨要义,认为求解近代中国的发展困境应该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和本位主义,彻底拒斥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主义。回到历史语境,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非常有限,难以获得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的认可。即便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博弈对抗下,中国社会相继兴起了三次大论战(即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及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马克思主义依然在中国思想界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从理论进入实践,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功效被遮蔽。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发生了有关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农村的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剖析和解决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和壮大,而中国的“救亡运动”和“启蒙运动”呈现出新的迹象,在马克思主义“神力”指导下衍生出一条具有西方魔力和东方魅力相互“合璧”的中国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2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积淀着5000年中华文明发展的智慧,而且蕴涵着它走向未来的文化基因。回溯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在秩序和意义层面构建一套人类文明的全新形态,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不断突破了“西强东弱”的文化格局。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灵丹妙药”指导下“双创”发展(即“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的结果,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因子,植根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能与精神养料。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了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精神文化谱系,具体表现为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和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西迁精神、抗洪精神再到“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及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和抗疫精神等。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宝贵民族精神和文化,突出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升级的时代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蓬勃的内在生命力及其顽强的历史韧性。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提供了内在动力,彰显了中国道路、制度、理论与文化的内在优势。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经验

文化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密切关联,具有历史延续性和承接性。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26]中国共产党在探索 and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积淀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一)辩证统筹本土和外来两种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的

历史场景而展开,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重大变化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毛泽东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时就富有洞见地提出要继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数千年的珍贵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27]1941 年 5 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那些“言必称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进行了尖锐批评,指出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28]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建基于两个“老祖宗”,即“马列老祖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老祖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方法指引、智慧启示和经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礼治”中的忠诚守信、义利相合、责任意识等思想有利于塑造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益的价值取向。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同社会”“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中国梦”等本土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内涵具有逻辑同构性。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无为”“见素抱朴”“天人和乐”的基本思想、精神和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高度契合。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实现中华文明复兴才有希望。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近代以后也存在与时代脱节的方面,其中最缺少的就是科学技术,这也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的输入提供了前提。中国思想界正处于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异彩纷呈而无主导,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传入,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和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总体来看其在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思想结构当中尚未成为主导性要素。“中国何来”“中国何往”等问

题成为近代以来摆在中国知识精英面前的时代性课题。近代中国变局的本质,就是实现由小生产向大机器大生产的转型,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生存方式、价值观念转型。在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戏剧革命”“史学革命”“小说革命”等相继而起,“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社会思潮此起彼伏,“革命”与“救国”相互辉映、蔚然一色,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平移”和“嫁接”西方理论与制度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但最终结果都归于失败。基于此,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来文化优秀性,一个是我们社会的需要和可接受性。这就决定了尽管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也曾在中国传播,但都没有形成气候,由于缺少了社会需要这个文化“过滤器”,这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生存就难以为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效结合,其关键原因正在于社会需要。

(二)辩证统筹守正与创新两种手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民族的精神标识,凝聚着国家的灵魂力量。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精神独立的内在力量和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底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要立足于中国不同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深刻把握这一实践基础的“不变”与“变”。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再生和转换的必然要求。文化不可能是脱离社会形态的“普世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我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思想和文化的制约和影响而存在消极一面,这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对其进行取舍。萨义德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角逐舞台隐喻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指出它“不但不

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而是多种力量角逐甚或是权力较量的“场域”，“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30]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总是不遗余力地“唱衰”“抹黑”“丑化”和“捧杀”中国道路。事实上，“去马克思主义化”和“去共产党化”及任何“弱化”“虚化”党在文化领域领导地位的理论与实践，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政党土崩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美好图景只能沦为“水月镜花”。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中国奇迹和中国文化的“身份密码”，是构建国内价值认同和国际话语体系的理论根基，向中国和世界描绘了中国道路的美好景象。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分为先进文化及落后腐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必须正确引领社会思潮，自觉抵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失灵论”“失败论”及“意识形态淡化论”“指导思想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切实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标签化、边缘化和空泛化，义正辞严地同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中小学学科教材和论坛中“失语”“失踪”“失声”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文化与威胁、物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等“军事战略”相互并列，是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样式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可供选择的手段和方法之一。^[31]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和推进，既是实现“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转变的关键，又是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必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三维有效结合和再生。道路问题事关方向。精神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特征，一旦被无限融入异质性存在，只能亦步亦趋，重蹈覆辙，最终只能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体系的附庸。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及文化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不良社会思潮，绝不允许其遮蔽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型，有效应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双重挑战。基于

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有效弥合了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张力，建基于异域风情与中国语境的交互、再生，是实现“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转变的关键。如果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以“中”反“马”、以“西”反“马”，甚至“中”“西”联合反“马”，都是与中国实际相脱离的表现，此种情势下中国就有可能在“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墨守成规的老路”中迷失自我前进的正确方向。

（三）辩证统筹工具和价值两大属性

资本主义在中国方案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将文化的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罗素在中国讲学时一语中的地反思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行径。他说：“假如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将会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必须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优等文明的传教士，不再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从而极端无耻地自认为有权去剥削、压迫和诈骗中国人。”^[32]。在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中，中国人之所以摆脱西方探索的历史轨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彰显出人民性这个最鲜明品格。基于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文化的工具理性。一方面，保障民生经济与文化的结合和转型，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只有解决事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民生问题，确保其正当利益需求不受侵扰，解决其实际问题，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构筑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坚实基础，促进共识、凝聚人心，搭建最美“连心桥”，画出最大“同心圆”。另一方面，面对利益多样、阶层多元、诉求众多的现实，部分传媒主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淡化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忽视文化的社会效益，这也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集思广益、合力攻坚，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敏感点、风险点和关切点，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风险挑战。但我们必须同时警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无限增值的内在逻辑，促进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也

导致人在生命价值和意义层面的追求趋向于虚无,削弱了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认同,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遮蔽了人的生命本身的意义。从这个意义而言,新时代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来源于中华民族苦难的近代,也是对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的接续发展。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当代中国人要勇于接受挑战和考验,将爱国情、报国志和强国行有机统一,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滋养化育。^[33]

解码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密钥,正是由于其在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国历史上“犯上作乱”“王朝更迭”式的农民革命及近代以来国内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截然不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正在探索一条突破中国数千年来“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道路;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正在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逻辑,将价值的支点真正置于“多数人的利益”。深刻剖析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属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文明复兴具有重大意义。问题是客观的、现实的,问题的解决是理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新问题还会不断涌现。实践是科学研究的“富矿”。现实问题催生理论,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在问题与理论的互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西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历史虚无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蠢蠢欲动,当前我国思想界特别是互联网空间仍然存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价值观点,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多元对一元”利益和思想博弈格局,还有一些人重弹“全盘西化”或“全盘复古”老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手段、方法、价值和意义被引向歧途,在实践中成为一部分不怀好意敌对势力利用其实现自身目的的“遮羞板”。

四、结 语

百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断加以推进。当代中国文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软实力的有效展现形式之一,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形式多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拒斥和冲击。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构、建构、重构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贯穿中国道路的一根主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守这一主线,如果偏离,就会导致主次颠倒和本末倒置的错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是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断推进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成功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密钥。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在集聚科学理论增长中国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初心意识和使命意识,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千秋伟业!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0.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2:40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60.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7.

[11]瞿秋白.赤都心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226.

[12]王进芬.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J].人文杂志,2019,(10):16-22.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7.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7.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1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2.

[17]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1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

[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0]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

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21]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9.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3]聂锦芳.当代中国主要的哲学社会思潮及其社会效应[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45-51.

[2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

[2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2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5-10-15.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7.

[29]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

[30][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3.

[31][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412.

[32][英]罗素.罗素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22.

[33]田旭明.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12):51-61.

(责任编辑 张亨明)